

世界宗教研究译丛 | 卓新平 主编



Kirche im Pluralismus

Michael Welker

多元主义中的教会

[德]卫弥夏/著 瞿旭彤/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宗教研究译丛 卓新平 主编

Kirche im Pluralismus
Michael Welker

多元主义中的教会

[德]卫弥夏/著 瞿旭彤/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0-02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主义中的教会/[德]卫弥夏(Michael Welker)著;
瞿旭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

(世界宗教研究译丛/卓新平主编)

ISBN 978-7-5004-8444-8

I. 多… II. ①卫…②瞿… III. ①教会—研究 IV. ①B9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0634号

策划编辑 陈彪

特约编辑 李登贵等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68千字

定价 1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宗教研究译丛

主 编 卓新平

副主编 曹中建 张新鹰 金 泽

丛书总序

宗教反映出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宗教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与“人性”、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有着密切关联，展示出人的精神世界之丰富、复杂，并对世界大多数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重大影响。因此，人在自我反思和自我认知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这种宗教“灵性”，意识到其精神领域中的信仰特征。

宗教的历程与人类的发展密不可分，其经历的原始宗教、民族宗教、国家宗教和世界宗教各种形态都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复杂交织，其宗教的基本构建亦与人类社会结构有着种种吻合或重叠。宗教的存在迄今仍对世界上大多数人产生着广远而深入的影响。据统计，当前全世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已达50余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5%，其中信仰基督宗教的人数近2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世界穆斯林人数约13亿，为全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印度教有8亿多人、佛教3亿多人，新兴宗教1亿多人，其他各种民族宗教、本土宗教亦教派林立、信徒众多。宗教的存在与发展也会对整个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社会的走向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世界宗教问题，弄清其古今发展及存在态势。

从对宗教的理解而言，宗教指人对“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反映出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神人”或“天人”关系。从

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宗教”观念是由“宗”、“教”二字合并而成。按其语义,“宗”乃涵括自然崇拜和社会崇拜两大方面,前者指“禋于六宗”,即“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后者即“尊祖庙也”;都关涉到崇拜和礼仪活动。“教”则以理论教化方式来表示人们“对神道的信仰”,即“圣人以神道设教”、“修道之谓教”。“宗教”二字最初合用则见之于佛教术语,梁朝袁昂(459—540)在其《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中就已二字联用,论及“但应宗教,归依其有”。佛教以“宗教”来指崇奉佛陀及其弟子的教诲,其中“教”为佛陀所说,“宗”即佛陀弟子之传。在西方信仰传统中,religion 源自拉丁文表述,本意为“重视”对神灵的敬仰,以及神人之间的“结合”或重新联结。中文“宗教”术语通过佛教典籍的翻译而传入日本,其佛教界最初把用语难以表述的真理称为“宗”,而关于这种真理的教义则为“教”。自1868年起,日本明治政府的文书将西文 religion 译作“宗教”。这一中西关于“宗教”的术语由此相互关联,后又“假道日本而入中国”,如黄遵宪(1848—1905)在其1887年完稿、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已多次沿用日文“宗教”术语,其语义与西文 religion 则颇有关联。此后逐渐形成汉语“宗教”一词的现代语义,表示对“终极实在”的关切、追求和信奉。

宗教与人类社会及世界文明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因而是我们深入了解人类自我、弄清其社会及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不认识世界宗教,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世界历史,更谈不上对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之脉络神髓及其内在规律的掌握。而且,宗教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与人类学术领域的许多学科发展亦紧密相连,有着种种交织与重合。所以,我们观察、研究宗教学的学科发展对于促进跨学科研究、扩大学术视域、形成相关研究的交融互渗和综合优势、

繁荣我们的社会科学同样有其独特意义。

世界宗教的发展历史悠久、思想深邃，有着丰富的著述传世，这些宗教文献已成为重要的人类精神遗产。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对世界宗教从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意义上所展开的研究，留下了珍贵史料。但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之学科研究却起源于西方，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外宗教学者有着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而在当今世界宗教研究领域亦不断推陈出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也在中国学术界得到系统发展，中国学者开始对世界宗教展开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宗教中的重要著作和宗教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名著，由此以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并能从“翻译”求“会通”，最终获得“超胜”的结果。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基本建设，进行资料翻译、展开基础研究乃非常重要。我们在宗教学上要想“超胜”则必须积累各种学术资料、研习以往的学术成果，打好坚实的基础。而且，翻译、研究世界宗教的重要著述，也是研究世界文明体系、了解各种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翻译和研究既能使我们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又能帮助我们推陈出新、达到会通和超胜。基于这一意义，我们组织了“世界宗教研究译丛”，旨在不断翻译出版这一领域的经典名著、研究成果，以求能形成当今中国学界中西合璧、沟通并跨越东西方的宗教学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繁荣中国学术、促进世界和谐。为了这个目标，让我们共同努力。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008年1月6日

中文增订版序言

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西方的许多重要知识分子都在问：“有没有宗教与人类一起走向未来？”在 21 世纪的开端，这一问题发生了改变。今天，这一问题变成：“是经培育的宗教、还是未经培育的宗教，与人类一起走向未来？”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转变，这一问题又意味着什么？

经培育的和未经培育的宗教

“9·11”事件是这一思考转变的重要诱因之一。2001 年 9 月 11 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listen）^① 和恐怖分子撞毁纽约世贸中心的两座塔楼。不过，在促成问题发生改变的其他许多因素之中，还有美国小布什政府带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二元世界观，与此相应的布什总统及其行政部门原始蒙昧的霸权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在全世界威望的迅速下降。但是，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Religioesitaet），直至血腥的恐怖主义，只是“未经培育的宗教”（ungepflegter Religion）的

^① 或译“基要派”，“基要主义者”，下同。——中译注

2 多元主义中的教会（增订版）

一个方面，即宗教的暴政型变形。此外，我们还不得不在不同宗教的各种败坏形式中忍受其第二个方面，即未经培育的宗教的混乱型变形。〔在这些败坏的形式中〕这些宗教在内容上被抽空，变得愚昧和荒谬。这些形式脱离了历史的和理性的导向，从而脱离了教育和科学。这些形式丧失了尊重，即不再尊重在长期活跃的不同宗教中所保存的智慧，以及其中所保有的人类知识。这些形式不再理解宗教崇拜和宗教礼仪的意义内涵，因而倾向于这些崇拜和礼仪的持续改变，——由此发生的改变往往是毫无计划的，或者只对眼前的模式和方向感兴趣。而且，这些形式误识和丧失了从有担当能力的不同宗教中生发出来的、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塑造力量。

对暴政型和混乱型这两种形式的“未经培育的宗教”的忧虑，得到如下洞察极为显著的加强：今天，在世界总人口中，70%—80%的人都自称为某一宗教的“信奉者”（Anhaenger），而且，这一比例还有上升的趋势。尽管西方发生过现代的启蒙〔运动〕和多次的世俗化努力，基督教却在20世纪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敬虔运动（Froemmigkeitsbewegung），即出自五旬节派教会（Pfingskirchen）的所谓“灵恩运动”（charismatische Bewegung），这一运动如今有将近5亿的信奉者。它主要兴盛于拉丁美洲和非洲，不过在北美和欧洲也极为成功。

在东西冲突和冷战结束后，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地区出现了基督教敬虔〔形式〕和基督教教会的强劲复兴。在第三个千年的开端，即使是那些坚定反对宗教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教惊人的生命力和更新能力，以及人类历史的其他伟大宗教的生命力和更新能力。他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对宗教最大的怀疑，甚至憎恨和蔑视，也不应导致如下的〔后果〕，即放弃通过科学、法

律、媒体和政治对宗教的审慎观察。但是，宗教绝不单单是如下邪恶的“沉睡巨人”——对它的觉醒，我们只应害怕和尽可能阻止。

对在德国的我们来说，宗教在教育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慈善行为 and 影响力，也是实实在在（empirisch）和无法反驳的。〔柏林〕墙倒塌后，我们不得不看到现代宗教批判的如下异象：随着宗教的终结，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将欣欣向荣，只是纯粹的幻想而已。在德国去基督教化和去教会化最为厉害的地区，也依然是全德国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方面最为贫瘠的地方。反而观之，路德宗〔传统〕的芬兰拥有组织出众的教会性的青年事工，就统计数据而言，在欧洲一般而言的青年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居于首位。在这期间，西方的一些主要知识分子开始——往往是惊奇或诧异地——讨论“后世俗化的时代”（postsäkularen Zeitalter）。

如下论文的出发点在于：人类社会需要一种经培育的宗教，如同需要教育与科学、卫生与医疗保障、银行系统与有着既定秩序的经济、政治与法律一样。这些论文试图考察宗教、世界观、哲学与政治等方面发展之间完全具体的关联，——正是这些发展，导致了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教会和如今的欧美多元主义社会。

宗教改革作为一场反向运动（Gegenbewegung），反对的不仅是一个单一等级制的、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这一教会试图将人禁锢在未成熟状态（Unmündigkeit）和受教职人员监护的未独立状态之中。宗教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教育运动。路德和梅兰希顿（Melanchthon）等人的名字正是这项事业（Engagement）的代表。凭借圣经、信经（Bekenntnisse）和教理手册（Katechis-

men) 的帮助, 所有人都应能够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 由此, 必须在家庭和学校中引入教育, 必须革命性地改变在敬拜时和在大学中的教育。

而且, 宗教改革也充满了对权力划分 (Gewaltenteilung) 的激情。宗教与教育、法律与政治、公共意见与社会参与 (Engagement) 应互相加强。这应在一种多声音、多声调的发展中得以进行, ——这一发展尊重不同社会层面的 [各有差异的] 内在逻辑和组织形式。在此, 尤其是加尔文 (Calvin) 和改革宗教会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不过, 如下论文不想追述这些复杂的历史发展,^① 它们处理的更多是宗教改革和西方现代 [性] (Moderne) 在世界观、教会、社会和政治方面所结的一些果实。此外, 它们还将处理基督宗教所具有的一些规范性的潜能, ——这些潜能, 尚未完全地从宗教改革及其后续发展中得到开发和利用。

多系统的思考, 来自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启发

关于这些潜能, 我的认识不仅仅来自哲学和神学方面的研究, 而且来自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一方面特别是与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对话, 另一方面是与社会学家的对话。在研读英国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作品时, 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如下的必要性: 应通过结构化—多元主义的形式, 即多系统的形式, 取代一元主义的、二元的和

^① 参 Berndt Hamm 和 Michael Welker, 《宗教改革: 自由 [所具有] 的潜能》(Die Reformation. Pontentiale der Freiheit, Tuebingen: Mohr Siebeck, 2008)。

二元主义的思考形式、世界观和组织形式。在其生涯晚期，怀特海任教于哈佛。他自问道，为什么我们以为，凭借数学理论、宗教的思考形式、健康的人类理性，我们〔能够〕各自赢得关于真实的认识，发现和理解真理，可是，为什么这些对世界的不同进路往往难以，甚至根本就不能彼此理解。〔由此〕他提出一种多系统的思考，这种思考兼顾到不同认识领域（自然科学、宗教、健康的人类理性等）本有的合理性（Eigenrationalitaeten）。因而，尽管他没有提到〔“后现代”一词〕，但他仍然可被称为一位“后现代的”思想家。早在19世纪，尼采攻击处于一元主义的和二元的关联系统中的思想。怀特海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他并未放弃追求一种注重各方差异的、融合性的理论构建。他的做法也不同于他的许多学生，他们陶醉于其艰涩的主要作品《过程与实在》（*Prozess und Realitaet*）中的理论语言，他却发展出一种比较文化论（vergleichende Kulturtheorie）^①，并且为富有成果的跨学科桥梁理论（Brueckentheorien）提出许多有趣的建议^②；在跨学科的理解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同样天才般的、富有成果的思想，在社会理论方面，可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处见到。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中，卢曼是影响最大的德国思想家之一；他主要受到美国大社

①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5], Glasgow: Collins, 1975）。〔中译本两种：《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959年）；《科学与现代世界》，傅培荣译，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中译注〕

② Alfred North Whitehead, 《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 [1933], New York and London: Free Press, 1967）。〔中译本：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中译注〕

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作品的影响。^① 我们曾批判性地考察过卢曼的宗教理论。^② 在我们看来，比起其理论对手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社会分析来，卢曼社会理论的多系统进路更令人信服。^③ 在关于“多元主义的权力循环”的想法中，我将卢曼（关于多元主义社会的多系统的内在构造 [Verfassung]）和哈贝马斯（关于多元主义社会中各团体的“公民社会的”交织状态）的思想进路彼此联系在一起。只有凭借这样全面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西方多元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循环。

多元主义中的教会

直到今天，西方的现代社会都难以理解它们自身的内在构造（Aufbau）。人们继续在一元主义的、二元的和二元主义的形式中进行思考。一旦尝试走出这些形式，他们就在思考上失控。在“后现代”这一名词下，许多地方涌现出对生活态度和生命形式的

① 比如，Niklas Luhmann, 《宗教的功能》（*Funktion der Religion*, Neuauflage, Frankfurt: Suhrkamp, 2004）；氏著，《社会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 hg. von André Kieserling, Frankfurt: Suhrkamp, 2000）。（后者中译本：《社会的宗教》，周怡君等译，商周出版社 2004 年版——中译注）

② Michael Welker 主编，《神学与功能系统论：神学讨论中的卢曼宗教社会学》（*Theologie und funktionale Systemtheorie. Luhmanns Religionssoziologie in the theologischer Diskussion*, stw 495, Frankfurt: Suhrkamp, 1985）；氏著，“卢曼论社会的宗教”（Niklas Luhmanns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载于《国际社会学》（*Sociologia Internationalis* 29 [1991] 2, 149—157）；W. Krawietz 和 M. Welker 主编，《对社会系统理论的批判：与卢曼主要著作的商榷》（*Kritik der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Luhmanns Hauptwerk*, stw 996, Frankfurt: Suhrkamp, 2. Auflage, 1998）。

③ 参 Michael Welker, “哈贝马斯和拉辛格论宗教的未来”（Habermas und Ratzinger zur Zukunft der Religion），载《新教神学》（*Evangelische Theologie* 68 [2008], 310—314）。

“多元性”、“多样化”以及“合理性”的散漫（diffuse）激情。但是，许多人正确地看到，这样的激情是缺乏具体方案的（konzeptionslos）、毫无根基的，而且是受到相对主义威胁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导向危机与如下相关，即西方世界的哲学与宗教思考还半心半意地固执于希腊—罗马的遗产。正是这遗产，将其禁锢在老旧的一元主义的和二元—二元主义的思考模式中。一方面在对现代哲学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在关于圣灵神学的研究中，^① 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将使〔读者〕注意到“〔圣〕灵的多元主义”的导向力。在第二章中，我将指出，为什么现代基督教最重要的宗教性的思想导向，即古典的有神论和虔诚的存在主义，丧失了它们的担当能力。20 世纪几乎所有主要的德语神学家，比如，朋霍费尔（Bonhoeffer）^②、巴特（Karl Barth）和莫尔特曼（Juergen Moltmann），^③ 都察觉到了这种担当能力的丧失。由此，朋霍费尔提倡一种“对宗教的批判”和一种“对基督教的后宗教解释”（nachreligiose Interpretation des Christentums）。但是，当时

① Michael Welker, 《上帝的灵：圣灵神学》（*Gottes Geist. Theologie des Heiligen Geistes*, 3. Auflage, Neukirchen - Vluyn: Neukirchener, 2005）。

② 或译“潘霍华”。——中译注

③ 参 Karl Barth, 《教会教义学》第二卷第二部分（KD [Kirchliche Dogmatik] II/2, 5. Auflage, Zue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74）；Bonhoeffer, 《抵抗与顺从：狱中书简》（*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 hg. von Christian Gremmels u. a., Werke 8, Muenchen: Kaiser, 1998）；Juergen Moltmann,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6. Auflage, Guetersloh: Kaiser/Guetersloher, 1993）。关于对这些思想家的理解，可参 Michael Welker, 《神学特色：施莱尔马赫、巴特、朋霍费尔、莫尔特曼》（*Theologische Profile. Schleiermacher—Barth—Bonhoeffer—Moltmann*, Edition Chrismon, Frankfurt: Hansisches Druck—und Verlagshaus, 2009）。（Bonhoeffer 作品有译自英文缩编本的中译本：《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中译注）

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这种倡议。在这样的处境中，当时的人们试图固执于民族（Volk）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这种固执导致了“民族教会”（voelkischen Kirche）这样糟糕的意识形态和异端；今天，不再有人愿意赞成这种教会。但是，即使在二战后的时代，还是有人在德国喜欢用“大众教会”（Volkskirche）这样的概念进行思想游戏。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有许多的思考也在走向类似的方向。比如，在如今的俄国，人们乐于召唤出“教会与国家的交响曲”。

在第三章“大众教会的神话”中，我试图指出这一导向的多变特征。在此，我参考了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著作中对神话及其内在合理性的精彩分析。^① 以宗教性的错误导向为终结的极端道路，正是信仰在一种“主体主义信仰”中被抽空的结果。在第七章中，我分析了这种“主体主义的信仰”，并以圣经对信仰的一种理解与之对照。宗教信仰的主体主义形式，虽然将许多人作为“沉默的分有者”与宗教紧密关联，却导致了一种孤立和自恋的敬虔〔形式〕；在我看来，这种敬虔〔形式〕属于当今西方世界最为严重的文化危机现象。对这些危机现象，我在第四到第六章中试图建构性地做出回应。

第四章试图使外在的观察者注意到，在慈善、社会服务、道德—法律、国际—普世合一以及政治—道德方面，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构造（Verfassung）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本章

① Hans Blumenberg, 《对神话所作的工》（*Arbeit am Mythos*, Frankfurt: Suhrkamp, 1979）。参 Michael Welker, “与普罗米修斯认同：在陌生世界中的神话——论 H. Blumenberg 的著作〈对神话所作的工〉”（*Identifikation mit Prometheus. Mythos in einer fremden Welt. Zu H. Blumenbergs Buch: Arbeit an Mythos*），载《新教评论》（*Evangelische Kommentare* 14 [1981], 750f., 711）。

写于近乎 20 年前，其目的在于，抵制当时欧洲部分地区出现的疏远教会和脱离教会的潮流；不过，这一潮流如今已经减退。第五章呈现的是我的初步努力之一，即将基督论的和圣灵论的导向彼此关联。也就是说，试图指出为什么在以耶稣基督和圣灵为导向时，人们不应害怕一种多维度的、多声调的以及“多元主义的”导向。这些想法在第六章中得到继续深入，并且具体到关于历史耶稣的以及关于耶稣复活的困难言论的研究。在与解经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对话中，我们推进了这些研究。^① 这些研究构成了我即将完成的如下作品的基础：《上帝的启示：基督论》（*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有意将本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我为此谨致谢忱。对瞿旭彤先生的认真翻译，我也特此深表感谢。

卫弥夏

2009 年夏，海德堡

① John Polkinghorne 和 Michael Welker 主编，《世界的终结和上帝的不同终结：从科学和神学看末世论》（*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Ends of God: Science and Theology on Eschatology*,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second printing, 2000）；Ted Peters, Robert Russell 和 Michael Welker 主编，《复活：来自神学和科学的评估》（*Resurrection: Theological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Hans - Joachim Eckstein 和 Michael Welker 主编，《复活的真实性》（*Die Wirklichkeit der Auferstehung*, 3. Auflage, Neukirchen - Vluyn: Neukirchener, 2007）。

② Neukirchen - Vluyn: Neukirchener, 2010.

Vorwort zur erweiterten chinesischen Ausgabe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des 20. Jahrhunderts ging unter vielen führenden Intellektuellen im Westen die Frage um: “Geht die Menschheit in eine Zukunft mit Religion oder ohne Religion?” Diese Frage hat sich zu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verschoben. Sie lautet heute: “Geht die Menschheit in eine Zukunft mit gepflegter Religion oder mit ungepflegter Religion?” Was förderte diesen Umbruch, und was ist mit der neuen Frage gemeint?

I. GEPFLEGTE UND UNGEPFLEGTE RELIGION

Ein wichtiger Auslöser für das Umdenken war “9/11”, die Zerstörung der beiden Türme des New Yorker World Trade Center am 11. September 2001 durch islamische Fundamentalisten und Terroristen. Weitere Faktoren für die Veränderung der Fragestellung waren aber auch die christlich – fundamentalistisch gefärbte du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 der Bush II Regierung in den USA, die entsprechend primitive Hegemonial – Politik des Präsidenten und seiner Administration und, damit einhergehend, der schnelle Verfall des Ansehens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in aller Welt. Fundamentalistische Religiosität in ihrem ganzen